

雪
訊
在
杭

杭州



鲁迅在杭州

(《西湖丛书》第一辑)

《西湖》文艺编辑部编

一九七九年三月



从日本回国后

1909年摄于杭州



“木瓜之役”胜利后与浙江两级师范教员合影

1909年冬摄于杭州“湖州会馆” 前排右起第三人为鲁迅

说 明

为了给业余和专业文艺工作者以及大专院校中文系师生提供有关鲁迅在杭州活动的资料，本刊特编印了《鲁迅在杭州》一书。本书所收文章，大部分来自书、报，小部分是请人撰写的，过去书报上的文章，在辑入本书时，一般也都请原作者进行了校正增删。

本书系请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钟敬文教授代编的。它作为本刊编印的《西湖丛书》第一辑，在内部发行。在编印过程中曾得到山东师院聊城分院薛绥之同志的指导帮助，特此表示感谢。

由于时间仓促，掌握资料有限，鲁迅在杭州的活动资料一定还有不少遗漏，有待以后有机会续补。限于水平和条件，错误在所难免，恳请批评指正。

《西湖》文艺编辑部

1979.3.23

目 录

鲁迅在杭州	钦文(1)
鲁迅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	王祖勋 董舒林(13)
谈鲁迅在杭州教书	许寿裳(26)
关于鲁迅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一些情况	杨莘耜(30)
回忆鲁迅先生	张宗祥(32)
关于鲁迅在杭州九峰草堂的问题	费在山(36)
鲁迅翁杂忆	夏丏尊(39)
谈鲁迅先生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	吴克刚(42)
所谓“木瓜之役”	林辰(45)
生理实验术要略	周树人(48)
关于《生理实验术要略》的说明	熊融(52)
鲁迅先生和植物学	乔峰(56)
读鲁迅先生所编《生理学讲义》	王玢(62)
忆鲁迅先生一九二八年杭州之游	川島(69)
鲁迅先生和假鲁迅	许钦文(77)
关于鲁迅《阻郁达夫移家杭州》诗的一些史实	丁景唐(79)
“木瓜之役”摄影题记	杨莘耜(87)

关于“木瓜之役” 杨天石辑录 (90)

两级师范训词(夏震武)——专电——全浙师范大风潮纪详——任期一日之师范监督——专电——全浙师范学堂大风潮续志——师范教员全体上增中丞书——夏监督致许教务长书——夏监督致各教员函——夏监督致全体学生函——全浙师范学堂大风潮三志——师范教员上学部电——提学使致师范监督函——师范监督复提学使函——师范学堂近事续志——师范教务长等上浙抚公禀——全浙师范学堂之现状——再看全浙师范之怪状——三志全浙师范之怪状——浙江旅沪学会告白——两级师范风潮再志——学界公启——夏监督牌示——浙江师范学堂风潮五志——全浙学界公鉴——两级师范消弭风潮之办法——袁提学与全浙师范——两级师范大风潮余纪——提学接办师校之替人——夏会长请派大员彻查师范风潮——浙抚取消夏监督之用意——浙江师范学堂冲突风潮咸言——论夏震武——浙抚饬查师范风潮——杭州师范学堂解散日记——杭州某君论师范风潮书——留别两浙父老书——浙江教育总会咨抚院文——两级师范学生送夏涤庵先生北上文——夏灵峰先生行略——夏灵峰先生墓志铭——关于夏震武——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木瓜酒”

鲁迅在杭州活动简表 朱金顺 (127)

鲁 迅 在 杭 州

钦 文

鲁迅先生于一八九七年春由在家里帮工的章庆陪同到杭州，在花牌楼住了几天，为着探望祖父和二弟等。祖父周介孚，由进士而翰林，在翰林院做了编修，又做了内阁中书的京官。一八九二年“丁母忧”，照例请假回家“守孝”。不久“乡试”，浙江的主考是“同年”。他替亲戚朋友的考生去活动，把那些考生的名单和由他们集合起来一万两银子的期票封在信内派人送去。信到时有旁人在座，被送信的人因要收条说穿，只好当场拆看。祖父以不能躲避自首，就在杭州司狱司“监候”。也以同年等关系，受到照顾，得在附近寓居家属，随时送衣食，照料生活。这事情本由潘姨和小叔伯升担任。伯升去南京读书后，由二弟接替。鲁迅先生也参加这工作，去探望时随身带去许多东西。离杭回家前，他从申报馆派报售书处买了《徐霞客游记》六本，《春融堂笔记》二本，石印宋本《唐人合集》十本，画报二本。回家时还带归《历下志游》二本，《淮军平捻记》二本，《梅岭百鸟画谱》三本，《虎口余生记》一本，画报一本，《紫气东来图》一张，月份牌一张。东西不少，固然以书籍为主，而且其中没有一种是属于四书五经的。鲁迅先生生于一八八一年九月，当时还没有十六足岁。从这些书目，也可见他是从青少年时期起就很注意野史和绘画的。

标题《鲁迅在杭州》，其实“鲁迅”二字，要到一九一八年

发表《狂人日记》时才开始用作笔名，他为探望祖父到杭州花牌楼时是叫做豫亭的。

鲁迅先生在《范爱农》上追叙辛亥革命前夕和刚光复时的对话：“哦哦，你是鲁迅！”“老迅，我们今天不喝酒了。我要去看看光复的绍兴。我们同去。”虽然鲁迅先生早在日本时就用过“迅行”的笔名；但照语气看，这里的“老迅”，显然是“鲁迅”的昵称。如果呆板地写作“你是周树人！”对于未熟悉鲁迅先生的年青读者，或者反而发生疑问。依照此例，这里写作“鲁迅”，是没有问题的罢。

鲁迅先生于一八九八年闰三月上旬从绍兴出发去南京读书，经过杭州，又去看了祖父。当年十月回家，十一月重去南京。一八九九年寒假回家，假期满后再去南京。一九〇〇年寒假也回家，经过杭州，都在花牌楼略一停留，去看了祖父。以后在南京矿务学堂（照《鲁迅小说里的人物》这名称符合事实）毕业，一九〇二年去日本留学，回家经过杭州，不再在花牌楼停留，因由刑部尚书薛允升奏请，依照庚子年刑部在狱人犯悉予宽免的例，又说周介孚丁忧守孝，是个孝子。祖父恢复自由，回到绍兴家里去了。不过当时交通不便，从绍兴乘船到西兴，过沙地，走长长的跳板，坐牛车上帆船，渡过钱塘江，到了杭州城里，还得乘驳船到拱宸桥，才得搭小火轮的拖船去上海。

鲁迅先生一九〇九年从日本回国，在浙江省两级师范学堂高级师范部任教，担任生理学和化学的教课，并给日本教师当翻译员。他本在东京研究文艺，有许多计划，忽然回国，因为母亲和别的几个人很希望他有经济上的帮助。当时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监督（校长）是沈钧儒（衡山），教务长是好朋友许寿裳，是预先约好才于六月间回国来的。

鲁迅先生教生理学，在当时可算是一个特点的是，应学生的要求，也教生殖器系统。但和学生约定，在教到这个部分的时候

不许笑，说是讲这一部分的时候态度要严肃，如果有人发笑，严肃的空气就被破坏了。讲的效果很好，别班里没有听到的人也要讲义。鲁迅先生说是恐怕看不懂，因有好些新记号，象把男子的生殖器用“了”标记，女子的生殖器用“也”标记。精子是用“午”标记的。讲义又是写得简单扼要的。详细说明，在于口头讲解。可是剩下的讲义，也就让需要的人拿去了。在讲义上，还有用“么”代替细胞等的记号。

鲁迅先生教化学的课堂上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试验氢气的燃烧，察觉忘记了带火柴。他在离开教室去拿火柴以前，告诉学生：不要触动那收好了氢气的玻璃瓶，以免点起火来爆炸。可是拿得火柴回来，一点燃，玻璃瓶就爆炸，炸破了手，鲜红的血溅满了雪白的硬袖和点名簿时，发现前排的座位都空了。当时优级师范的学生，年纪有好些是比鲁迅大的。以后在北京，鲁迅先生提到这件事情时，总是说，“他们也相信我，也不相信我。如果相信我的话，无须放进空气试看是否会炸了；否则不相信，认定不会炸，那就不用离开座位远避了。”

还有一件有关的事情，鲁迅先生到了北京以后，也是常常谈起的，就是学生理学的学生问他，他在仙台学医时，当初解剖人的尸体，在动刀以前，有过些什么感觉。说是当初解剖完整的人体，特别是对少女和儿童，的确不忍，难以下手，非特别鼓起勇气来不可。后来惯了，也就不再感到什么了。

鲁迅先生教书，循循善诱，讲解清楚，很受学生欢迎；这当然由于备课充分，对于教材，调查研究得仔细周到。但他还要帮助许寿裳翻译讲义，画插图。又不放弃进修，总是到了深夜还在灯下用功的。睡得迟，肚子要饿，因此校工陈福，每天都要给他买好强盗牌的纸烟、颐香斋的条头糕，或者麻酥糖。

鲁迅先生在杭州教书一年，只游过一次西湖，还是许寿裳作东道，宴新亲，请他作陪的。他对于西湖十景，并不感什么兴

趣。一般人以为烟波千顷的“平湖秋月”和“三潭印月”是值得留恋忘返的，鲁迅先生看着，只说平平而已。“保俶塔如美人，雷峰塔如醉汉”，他也只说是平平而已的。鲁迅先生对于西子湖畔的景物的确不感什么兴趣。因为一意谋改革，忙于调查研究。他一九二四年在《论雷峰塔的倒掉》上说，“雷峰夕照的真景我也见过，并不见佳”，而且把雷峰塔和保俶塔搞错了。一九二四年距一九〇九年并不远，如果感兴趣，认真观察，是不至于就记错的。可是鲁迅先生，星期日，常常到郊区去徘徊，不是游山玩水，而是作生物学的调查研究，采集各种动物、植物。满载而归，接着加以整理，剥制，压平，标名，做成标本。两级师范的校址在杭州下城区贡院前，原是科举考场的地方，前后七进房屋，据说是按照日本东京高等师范的格式造的。后来作为第一师范的校舍，又改办第一中学，一九二九年联合几个中等学校成立杭州高级中学，简称杭高。现在又是第一中学了。鲁迅先生住过的房间在第一进西边的楼上，已经布置成鲁迅先生纪念室，陈列着好些值得注意的纪念品，墙上挂着许多放大照片和图画。前年我看时，说是还有好些鲁迅先生手制的标本正在整理，整理好后就放到那里去陈列，现在可能已经陈列起来了。在那些陈列品中，最突出的一项是《木瓜之役》，照相有原来的和放大了的两种，还有特别放大鲁迅先生的正在那里进行斗争的绘画。

鲁迅先生到两级师范后不到半年，监督沈钧儒因当选咨议局副议长辞职离去。后任是以道学自命的夏震武。他一到堂首先同教务长冲突起来，他要许寿裳陪着去拜孔丘，许寿裳不去。而且对于住堂的教员不照当时的习惯去分别拜会，只差人分送了张名片。教员们认为他不礼貌，于气愤中会聚会议厅，要夏震武出席。他还要大摆其臭架子。教员们更加气愤了，一哄而散。许寿裳向原监督辞职，搬到堂外去住了。鲁迅先生也就辞职离堂。接着夏丐尊、钱家治、张宗祥、章嵚、朱希祖、张邦华、冯祖荀、

胡濬济、杨乃康、沈朗斋等也都辞职，搬到堂外去住；张宗祥是本来住在高等学堂里的。夏震武写信给许寿裳说他“离经叛道，非圣侮法。”许寿裳回信说夏震武“理学欺人，大言侮实。”夏震武一派的人还想挣扎，打算提前一个月放寒假，破坏教职员他们的团结。可是别个学堂里的教员也起来声援了，呈文提学司，说提前一个月放寒假是不合章则的。夏震武这才不得不勉强辞职，监督由高等学堂的监督孙智敏兼任。鲁迅先生叫夏震武为木强，后来大家叫夏震武为夏木瓜。夏木瓜被迫辞职后，鲁迅先生和许寿裳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他们和因斗夏木瓜而搬到堂外去住的教员都搬回堂来，开了个“木瓜纪念会”，并且拍了团体照。张宗祥在那照片上题了《木瓜之役》。他保存了好几张这种照片，一直到他八十岁处理他所收藏的图书和文物时，检出一张来送给我，得意地笑着说，“难得的！”我早在将到八十岁时就把这照片交给绍兴鲁迅纪念馆保存。

《木瓜之役》是反孔同尊孔的斗争，在五四运动的十年以前。后来浙江第一师范发生“非孝”运动的风潮，影响所及，和《木瓜之役》的斗争是不无关系的罢。五四运动时期，北京方面有所号召，有所倡导，在浙江，首先响应的总是第一师范，其次是宁波第四师范，第三是绍兴第五师范。我在第五师范读书时，教员多半是从优级师范毕业出来的。

虽然打退了夏木瓜，可是鲁迅先生，一到第二年的暑假，就回绍兴到府中学堂去教书了。在离开两级师范学堂以前，鲁迅先生还做了一件使人注意的小事情，就是因为听人说大井巷聚丰园菜馆的烧鸭子味美，就邀了两个朋友去，三个人吃了一只大鸭子，还吃了别的菜，被人说作“豪兴大发”。其实鲁迅先生，这样并不是创举。他在南京读书时，成绩优异，惟一的得到金质奖章，他把它卖掉买书，剩余的钱就买得糖果点心，请同学们大吃。以后在北京，虽然象《端午节》上所写，官俸和薪水都拖欠

得很厉害，官成了灾官，教员成了灾教员，他做官兼教书，生活还是很困难。可是收到些俸、薪，不过百分之几的，总也要买些点心大吃一下，首先是买他母亲爱吃的东西。我们小字辈的，如果在一起，也得甜一甜，有时甚至给我们留起一份的。我爱吃西单滨来香的点心，也是从阜内西三条吃上瘾的。这也反映着鲁迅先生平常饮食的简陋，想吃做不到，一有机会就要多吃些。推己及人，所以常常邀得友好一道享受。还有一个关系，为着创作，他随时“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对于某个地方的特产、异味，总也是要尽可能地体味一下的。

一九一二年一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先生做临时大总统，鲁迅先生由教育总长蔡元培邀请做部员。可是鲁迅先生，离开绍兴以后，是先在杭州办些时候公事的，因为当时南京房屋不多，一时安排不好。那地点在下城区菜市桥附近的头发巷，叫做九峰旧庐的房屋。这是富翁王体仁（绶珊）的藏书楼，多善本地方志。后来书归北京清华大学，房子卖给老浙大——浙大医院。现在是在医大附属第一医院范围内的了。

鲁迅先生跟教育部北上以后，曾于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为着母亲六十大寿，从北京回到绍兴，往返都是经过杭州的。到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为了聚族而居的老屋已经卖掉，迎接母亲等北上，三日中午到达杭州，在清泰第二旅馆住了一夜，到中国银行去看了蔡谷清，又到捷运公司去了解情况。这次经过杭州要停留一天，因为搬家，人多行李多，要做准备工作的。蔡谷清是蔡鹤卿（元培）的兄弟，曾在日本同道留学，鲁迅先生也给他起过绰号，托熟，所以晚上到他家里去吃夜饭。这时沪杭已通火车，所以鲁迅先生接得母亲等，于二十五日渡过钱塘江，住钱江旅馆，蔡谷清派了人去帮忙。鲁迅先生把大件行李交给了捷运公司，就进城去访问蔡谷清，第二天就从南星桥站上火车往上海。

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二日，我陪伴鲁迅先生和景宋乘夜快车到

杭州，住在湖滨清泰第二旅馆西边的楼上，狭长的房间里并排设着三张床铺，是由川岛预先订好的。他和孙斐君，同到城站来迎接，到时虽已半夜，很顺利到了旅馆，因为一切都已由川岛夫妇安排好了。这清泰第二旅馆并不是一九一九年鲁迅先生住过的清泰第二旅馆，那是在城站附近的。“清泰”是城站旁边城门的名称。杭州“通商”以后，闹市本在拱宸桥，日本租界也在那里，沪杭通火车以后，重点渐渐移向城站的羊市街。所以有了清泰旅馆又开设清泰第二旅馆，是分馆性质的。当初有些人把城站叫做“火车码头”，因为杭州，新式交通工具是轮船比火车先有的。由于交通方便起来，来游西湖的人不断增加。香客是一向很多的。游人、香客都喜欢住在西湖边上，这是清泰第二旅馆迁移的原因。鲁迅先生却两处都曾住过。

鲁迅先生洗过手脸，喝了龙井茶，时候已经不早，章、孙告辞，将相地跨出房门下楼去了。鲁迅先生盯着我严肃地说，“钦文，你留在这里。以后白天有事，你尽管做去，晚上可一定要到这里来！”并且指定我睡在中间的一张床铺上。当我刚走进这房间时，一时暗自疑问，为什么要预订三张床铺的房间？以为大概只有这个房间紧靠西湖，便于观望，也就不再猜想了。这时我才明白，原是鲁迅先生交代的。当时我和章、孙都在杭州教书，趁放暑假，我和川岛都在上海停留了些日子。后来约定，他先回到杭州来布置一下，我和鲁迅先生同行，原来也是鲁迅先生指定我陪伴的。这两件事有着共同的关系，就是为着防备麻烦。在这不久以前，董秋芳被国民党浙江省政府通缉，一个熟人暗中通知我，我当晚掩护他从小路溜到上海租界里去。他的兄弟到杭州来收拾他的东西，在旅馆里写信给他，给宪兵发现，就把他的兄弟抓到宪兵营里去。我得到这消息，已经半夜，当即设法保了他出来，主要是旁若无人地闯进去，先大声批评一下，以为我可有什么来头，就模模糊糊地放出来了。鲁迅先生知道我对付这种麻烦

已经有了点经验，所以要我伴行，而且晚上住在一起。麻烦的确在火车上就发生了一点，我们坐在二等车厢里，空得很，有点高谈阔论的样子。景宋广东腔的话，浙江人又听不大清楚。趁夜车为着凉快些，我们到嘉兴才吃晚饭。两个宪兵早就在我们的一边打圈子，等到我们吃了半餐饭，就来开口了，说是要检查提箱。

“为什么？”我高声责问。

“有一股香气，”四只眼睛都盯在鲁迅先生的脸上齐声说，“好象是鸦……”

“香气是在我们吃的大菜里呀，”我戏笑着表示愤怒地说，“胡闹做什么！”

他们这才红着脸离去。

第二天上午，郑奠知道鲁迅先生已到杭州，大概是川岛告诉他的，就赶到清泰第二旅馆来，邀请鲁迅先生和景宋到孤山的楼外楼去吃中饭。当时郑奠在老浙大任教。他原叫做介石，“一二·一”以后不愿意再用这个字，改作石君了。他要我和川岛等作陪，一道吃了西湖醋鱼和莼菜的名菜。现在孤山的楼外楼以前叫做太和园，解放初期景宋到杭州来，住在“里西湖”的新新旅馆里，邀我吃饭，在现在的楼外楼，但还是叫做太和园的。当时的楼外楼位置在现在的楼外楼的东面。吃了饭就转到西泠印社去喝龙井茶，鲁迅先生从社里买得汉画像和什么墓志各一张，共洋三元。又以一元四角钱买得《贯休画罗汉象石刻》影印本一本。另买一卷《摹刻雷峰塔砖中经》，只花了四角钱。边谈边喝龙井茶，直到傍晚才回旅馆，不久孙斐君带着她的女儿来到，这孩子当时还只有四岁，鲁迅先生握着她的小手叫她蜜斯燕燕。晚上川岛请鲁迅先生和景宋到延龄路（现称延安路）龙翔桥邮局那边楼上的功德林吃素餐。往常鲁迅先生不愿意到素菜馆里去吃饭，并非他不喜欢吃素菜，而是厌恶素菜要用荤菜的名称，什么素鸡、素鱼、素鸭、素扣肉。但他对于友好已经决定了的这类小事情是从

不固执己见而计较的。吃了还说那些素菜做得好，尤其称赞那碗笋油——清炖笋干尖。可是第三天鲁迅先生泻了，只好吃药在旅馆里休息了半天。我疑心是从素菜上多吃了麻油的缘故。为使香味好，素菜上总是多浇些小磨麻油的。记得二六年春，我带领学生到天台山去，在山上一个星期，整整泻了一个星期。餐餐吃毛笋煮芥菜，麻油浇得多，又鲜又香，因此泻肚子，是下山以后才察觉的，因为不再多吃麻油，也就不再泻了。

十四日中午，我请鲁迅先生等在三义楼吃饭。取其近便，不但清泰第二旅馆很近，川岛他们从西浣纱路过来也是便当的。这个菜馆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西湖醋鱼、炒虾仁和虾子鞭笋总还做得不错。江南各省吃笋是相当普遍的，但吃鞭笋，浙江以外恐怕不多见。虾子鞭笋在鲁迅先生总也是家乡风味的一种。十五日鲁迅先生约我们在楼外楼一道吃中饭。我的一个兄弟到清泰第二旅馆来找我接洽事情，鲁迅先生知道后，也就邀他一道到楼外楼去吃中饭，鲁迅先生还从他了解了些杭州商界的情况。饭后到虎跑去休息，那里凉快，龙井茶叶虎跑水，鲁迅先生喝了不少；茶汁淡了，重新泡一杯。虎跑的水含一种矿物质，密度高，装在碗里水面高突过碗边不溢出，放铜片在水面上，浮着，可以经过好些时不沉没。鲁迅先生看了这样的试验，也用这种水洗了头发。他又在那里观看了五百尊罗汉的浮雕。直到傍晚才回旅馆。

十六日鲁迅先生到城站抱经堂去买了王刻《红楼梦》，一部廿四本，石印《还魂记》，一部四本，《百美新咏》，一部四本，《八大山人画谱》一本。又到清河坊翁隆盛茶叶店去买了龙井茶叶和白菊花（翁隆盛已经搬到湖滨，改名狮峰茶叶店了）。十七日趁早晨凉快，鲁迅先生就偕景宋回到上海去。我送到城站，打算同去上海，鲁迅先生不让我跟去。鲁迅先生常说到杭州时要去浙江图书馆看书，因为那里多宋版、明版善本书。因为泻了肚，

又热，有点疲倦，提前回上海去了，没有实行到浙江图书馆去。不过约定，到第二年的秋天两个人都再来杭州，并且同到绍兴去看红叶。第二年八月六日晚上八时陶元庆患伤寒症死了，十月间开追悼会公葬，鲁迅先生决定来参加。到时海婴出世，景宋做产要照顾而中止。以后鲁迅先生连在上海都行动不自由了，常常要避难，平时在寓所，也不靠近窗口去露面。只是我，每次经过湖滨，到那并排开着三个窗门的楼下，总要仰面望着回想一下那些往事。后来为着扩展马路，把那楼屋拆掉了。旅馆的名称多次更改，也做过行政机关，最近是叫做人民旅馆。但我经过时还是要略一顿步回想一下，突出的一点是那天早上的事情：鲁迅先生盯着景宋问我，“钦文，你知道这是什么？”我被问得莫名其妙，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随即鲁迅先生自己解答了：“这是寒暑表，一点热就热呀，热呀！一点冷就冷呀，冷呀！这不是寒暑表么？”说了鲁迅先生认真地笑了。这使得景宋很窘。我竭力忍住笑，免得增加她的窘态。

许多人都说鲁迅先生这次到杭州是来度蜜月的。我总觉得这样的度蜜月很少有，要我睡在中间的一张床铺上。我也写过一篇关于“鲁迅先生度蜜月”的文章，说明无非是这么一回事。但也有人以为我既写过这个“度蜜月”，可见总是“度蜜月”的了。

鲁迅先生一九二四年在《彷徨·祝福》上说，“我是正在这一夜回到我的故乡鲁镇的。虽说故乡，然而已没有家，所以只得暂寓鲁四老爷的宅子里。”鲁迅先生已于一九一九年冬卖掉故乡的老屋，搬到北京去住，前面已经说清楚。说是“已没有家”，是合情合理的。既回到故乡，至少经过了杭州。但这件事在《鲁迅日记》上是找不到的。因为《祝福》是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这照日本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从“非实际的”一点，可以说是“白日的梦”。如过写上去，对标题来说，是个“蛇足”。

一九二八年春，在杭州孤山西泠桥边苏曼殊的坟旁出现了四